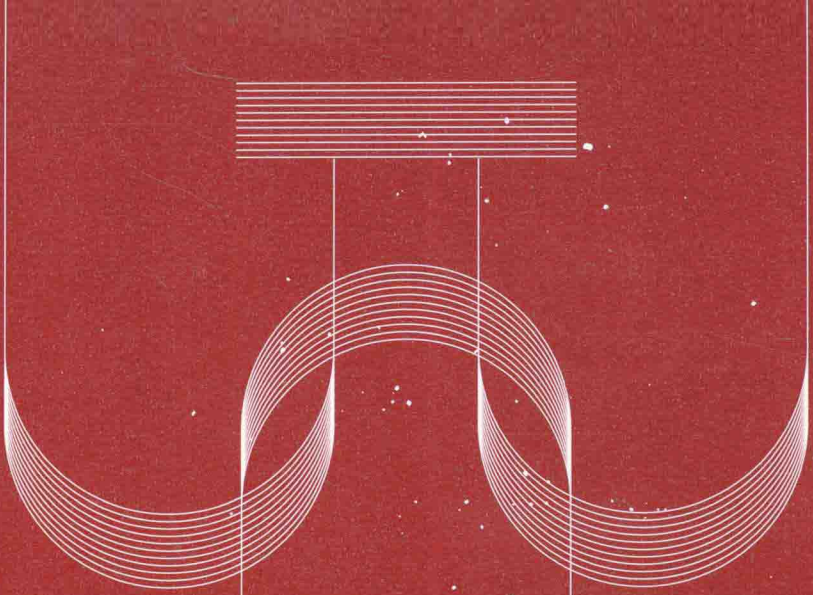




西方 哲学前沿

刘放桐先生从教60周年师生文集

刘放桐 等 / 著

The Frontiers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Mr. Liu Fangtong's
Educational Career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Frontiers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Celeb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Mr. Liu Fangtong's
Educational Career

刘放桐 等 / 著

西方
哲学
前沿

刘放桐先生从教
60周年师生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前沿:刘放桐先生从教 60 周年师生文集/
刘放桐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 - 7 - 208 - 12580 - 3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西方哲学-文集 IV.
①B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815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西方哲学前沿

——刘放桐先生从教 60 周年师生文集

刘放桐 等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46 插页 5 字数 838,000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580 - 3/B · 1090

定价 128.00 元

目 录

刘放桐教授访谈	(1)
---------------	-------

第一部分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 道路(论纲)	(29)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41)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52)

第二部分 德国哲学研究

德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71)
尼采与基督教	(80)
论康德的自由概念及其启示	(91)
弗雷格的等同性论题	(101)
亥姆霍兹: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先驱	(115)
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与柏拉图的理念	(123)
“不在场”之论争	(134)
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理论初论 ——事实与本质及各类本质之间的联系与区分	(145)

海德格尔后期文艺思想的形而上学遗痕	(155)
起源与目标	(166)
论海德格尔哲学的起点	(171)

第三部分 法国哲学研究

法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189)
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203)
萨特、勒维纳斯及他者问题	(213)
“喧哗”与“沉默” ——从德勒兹事件哲学的视角反思波洛克的“醉”与“线”	(227)
主体的真相 ——福柯与主体哲学	(240)

第四部分 英美哲学研究

英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261)
美国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及其近代变更 ——关于美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思考	(272)
生活形式及其与生活世界	(284)
论《逻辑哲学论》的节奏性、简单性与隐喻性：一种修辞学的解释	(293)
皮尔士现象学及其意义	(307)
杜威和实用主义真理论的三个层面	(316)
试析杜威哲学的若干理论困境	(328)
杜威论罗伊斯 ——1930 年 3 月 30 日纪念罗伊斯的演讲	(338)
杜威论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之基础	(348)
意义的推理论及其在价值表达式上的运用	(356)

第五部分 政治哲学研究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个体主体和现代化	(373)
城邦政治与理性哲学	(385)
洛克政治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意蕴	(393)
政治哲学阐释学视角下两篇《论犹太人问题》研究	
——鲍威尔与马克思公民资格理论之比较	(400)
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述评	(414)
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以波考克对共和主义语言的阐释为例	(424)
民主的回归与民主制的重建	
——哈耶克的民主批判及其启示	(434)

第六部分 宗教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西方宗教及其哲学的变更	(447)
“启蒙”观的转型和基督教神学在现代的尴尬	(458)
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不是《圣经》的宇宙观	(473)
论蒂里希的终极关怀思想	(483)
论柯恩的“纯粹”一神教	(491)
圣化时间:超越现代性的时间建筑学	
——海舍尔安息日思想述评	(500)
论拉纳“匿名基督徒”观念在“梵二会议”语境中的意义	(511)

第七部分 道德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更	
——对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的超越	(525)
克尔凯戈尔对理性主义的颠覆	(536)

从图腾到命运:试从身体与他者的关系考察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产生

与覆灭 (543)

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人性观 (562)

作为伦理学方法的反思平衡:意义与局限 (573)

权利话语的道德本体论

——查尔斯·泰勒对后权利时代的“善”的构思 (583)

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当代意蕴探究 (594)

麦金太尔:亚里士多德式的马克思主义? (603)

第八部分 中西哲学研究

西学的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

——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 (615)

实用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630)

“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 (647)

海德格尔和禅宗对人的追问之比较研究 (667)

生生与造作

——论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 (676)

哲学人类学述评 (705)

附录 复旦大学举行刘放桐教授执教 60 周年学术成就研讨会 (725)

刘放桐教授访谈

(2014年是刘放桐教授80华诞,亦是他从教60周年纪念。值此难忘的时刻,本文作者受《文汇报》(理论版)之托,约请刘老师进行了一次访谈。其中他对自己的人生与治学进行了全面的回顾。)

刘放桐 1934年5月2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今桃江县)。1950年考取湖南大学经济系。1956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1961年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至今。1981年,他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空白,推动了学科建设。本书于1990年和2000年适时地分别出了修订本和新编本,对促进国内本学科研究发展到新的阶段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现代中国哲学的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华盛顿英文版)等在国内学术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发起并与俞吾金共同主编《西方哲学通史》(10卷),目前正主编《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他的著作作为国内打开了一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窗口,让人们接受了新鲜的哲学养分。他首创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放到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中来审视,把这两种哲学结合起来研究。他提出,应该让对杜威哲学的理解回归到现实生活之中。在中国的语境中,刘放桐先生在很多哲学问题上都可谓开风气之先。

姜:刘老师,今年您已经从教60个年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无论是时代还是学术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能简单地和我们谈谈您早年的求学经历吗?

刘:我从1949年9月被人民政府委派作小学老师起,至今已有60多年了。但我后来又上大学和担任其他工作,实际教龄没有60年,不过按工龄算正好是60年了。

我出身湖南农村,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只断续读过两年中学,大部分中学课程都是在无人指导等困难条件下,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成的。1950年我以同等学力

身份参加高考。因无力支付旅费,从家乡到最近的考点长沙的一百公里路程往返都是步行。我参加了包括全国大部分大学的统考和湖南大学的单独招生。所幸都被录取。最后选读了湖南大学经济系。我也由此重新获得求学的机会。当时上大学不交学费,贫困生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但也只是解决温饱,很少有零花钱。想买参考书也很困难;因为无钱买车船票,每次从长沙回家看望父母,往返都是靠步行两整天,有一次一天居然走了一百公里(起早贪黑)。其实这样步行我从读高小开始就习惯了。读初中时学校离家近 30 公里,我都是自己挑着行李往返学校(住读)。校长为了锻炼学生,每天早晨赶学生爬山大致一小时。开始时大家叫苦连天,后来也都习惯了。

我早年确实经历了较多艰辛,但它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养成了勤于思索的习惯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特别是能吃苦耐劳,能承受压力,意志和性格上都得到了较好的锻炼。目标一经确定下来,我就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当年跳那么多级考大学,我绝不是投机,而是经历了一年多炼狱式的恶补。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编写《现代西方哲学》碰到多方面的严重困难,承受了沉重的非学术性的内外压力。个中艰辛,恐怕只有我自己知道。但这些我最后都克服了。像我这样没有完整地读完中学,主要课程完全靠无指导的自学也有很大局限性。学物理学却无法做实验必然不扎实,更重要的是,当时自学的主要是理科课程,对文科课程没有时间顾及,势必造成这方面的严重缺失。我在后来治学中一直为基础知识不扎实,特别是人文学科基础差而困扰。我主张现在的年轻同志也要锻炼能吃苦耐劳,能承受压力,但不赞成他们轻易跳级,避免“欲速则不达”。

姜:您在大学原来学的是经济学,后来是如何转向研究西方哲学这条道路的呢?对于你们那一代学者们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很感兴趣,而且会对我们很有启发的。

刘:1950 年我考大学,报考的是经济系,老实说,选读经济系对我来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只是因为当时国家号召搞经济建设,我就报了这个系。由于曾经对自然科学有过广泛的涉猎,又系统地学了 4 年经济学,给我奠定了一个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那时湖南大学经济系也开有哲学课,而且最早给我们上哲学课的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杨荣国先生。此外,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当时是我们学校的校长,他在全校讲解他的《实践论解说》时我们也去听。你看,虽然我们不是学哲学专业的,但是也有机会直接接触当时著名的哲学大家。记得当时两位名家的讲课都很深刻,杨荣国先生讲课时还总是穿插一些生动的中国哲学史的典故,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当时,尽管自己对哲学了解还不多,但他们的讲课却引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

1954 年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到北京的财政经济出版社,主要负责《农业经

济译丛》的编辑工作。业余时间除了阅读一些经济学著作外,更多涉猎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书籍。从经济学转向哲学的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一向是一个好奇心强又不安于现状的人,从高中到大学都是思维比较活跃的学生,对哲学有一定兴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受1955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掀起的那场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的触动,当时对实用主义批判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把实用主义哲学说得一无是处,众口一词指责它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但它们对实用主义的具体内容都语焉不详,至少我难以从中悟出个究竟来。现在看来,那场批判无疑开了建国后以“左”的政治压力来干预学术讨论的先河。不过我当时由于年轻,对这场批判的政治和理论含义并没有真正理解,甚至也没有去多想这方面的问题。然而,它却成为萌发我学习一些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契机。由于报刊上天天都在批实用主义,于是我就想找些材料看一看实用主义到底讲什么东西。那时的北京东安市场有很多旧书摊,我经常去那里买些自己感兴趣的旧书看。一次也是在那里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薛格洛夫编的《西方哲学史简编》。其中对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吸引了我,尽管对实用主义并没有太详细的介绍,但比起当时书店里可以买到的哲学读物来,内容还是要丰富得多。后来我又读了两本解放前翻译的梯利和韦伯的《西洋哲学史》,更感觉别有洞天。因此也产生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而真正开始走上哲学之路还是在1956年。那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年,当时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方针,特别是确定了双百方针,提出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口号。教育部决定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开始试招授予学位的正规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这是参照苏联的教育体制进行设立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间。我正好有志于继续深造,所以当即决定报考。本来按照本科所学专业和工作性质,我应该继续学经济学,但是由于强烈的兴趣驱使,我最终选择了报考西方哲学专业,当时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只有三个单位,北大、人大和科学院。我报考了人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而且被顺利录取。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副博士只招了1956年那一届,以后就没有再招过。

当时在人大副博士研究生包括我在内各专业一共只有三个人。进人大后我投师于当时大名鼎鼎的何思敬教授门下,由苗力田先生协助指导,何先生在延安时曾任社科院的副院长,曾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上过课。从此我正式踏上了学习与研究西方哲学的道路。那时人大哲学系刚刚成立。人大一开始位于北京市里,后来搬迁到市郊,和北大相邻,因此,我有机会经常去北大听课。当时听过很多著名学者的课,包括冯友兰、金岳霖、郑昕、贺麟、任华等人的,那时我虽然是人大的学生,但在人大上的课其

实并不很多,倒是大多数时间是在北大听课。

姜:这些先哲的教诲想必对您日后的哲学研究有着较大的影响。

刘:的确如此。这些先生都不约而同地主张学习西方哲学必须精读几部经典原著。当时他们推荐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这四部书我都认真读过,读《形而上学》花的功夫更多。这些先生大都主张厚积薄发,不鼓励多发表文章,但也有一些先生主张要勤于练笔。我觉得他们的话都有道理。我结合读原著发表过几篇文章,还结合参加当时的学术讨论发表过几篇文章。但也受“左”的影响写过几篇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权威的文章,我后来一直为此感到不安。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参与较多的一项工作就是编写“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哲学史,我对“五四”之后的中国哲学的知识就是在那时获得的。那是“大跃进”时期,人大哲学系想要编一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要我也参加。我和另外一个人负责收集和编辑“五四”以来的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材料,由于这个原因,我把自“五四”到1949年解放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的材料都仔细看了一遍,这使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五四”以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发展情况,也为我以后进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作了重要准备。

人大有一个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环境,这也促使我一开始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工作,就比较注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并力图把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我始终觉得这是在我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具体到我个人来说,如果说这些年学术上有一点成绩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这方面作了较大努力。

姜:您是在1961年初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工作的,您最初一些年是怎样工作的呢?

刘:复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是由我国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全增嘏先生创建的。我初到复旦后即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全先生和贺麟先生是清华留美预备班的前后届同学,他曾先后在斯坦福和哈佛研究哲学。当时他主管逻辑和西方哲学等方面的教学,我去的时候他正在修订他主编的《辞海》哲学卷外国哲学分卷,我协助他修订,部分条目由我负责新写。同时,我还承担了“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专题”等专业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工作。此外,一段时间,我除了做好复旦的教学工作外,还曾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工作过。这使我接触了不少科学哲学的文献,还编译了一些相关的材料。这些工作虽然不直接属于西方哲学范围,但是它们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扩大了我的知识

面,而且提高了我独立从事不同课题研究的能力。我一直认为,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定要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这不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而且是说必须有较为丰富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哲学的其他分支的知识。我国许多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卓有成就的专家都有这个特点。

姜:这是一种哲学研究的视野。我们都知道,刘老师一直致力于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研究,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不是也与这样一种视野有关?

刘:可以这么说吧。但是这样一种对话研究,也是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一点点地清晰起来的。当我探索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特别是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以往那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批判模式应当抛弃。在编写《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时,我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随着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在个案研究上的重大进步,特别是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倾向的克服和求实学风的兴起,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抛弃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旧的评价模式,建立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的评价模式。后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应当按照其本来面目,从其现实和历史的发展来认识和评价。在新的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必须重新研究和认识这两种哲学的本来意义及其历史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新的比较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不仅能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胜地位,特别是具体地揭示它作为当代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的意义,也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它在某些环节上的不足;不仅能揭示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片面性,也能揭示它们在时代和自然科学新的变更的推动下在某些方面可能取得的进步。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其自身,也可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而这也正体现了新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如果说在1990年以前编写《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时,我大体上还只是停留于抛弃旧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在此之后我就越来越尝试自觉地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研究了。这不只是将它们作简单的对比,而是用求实的、发展着的观点,从研究它们共同的和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出发,从对整个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出发,从整体上和各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上深入具体地研究这两种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路线,既揭示它们的原则区别,又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共同之处。在这个基础上,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

姜:西方哲学是您进入复旦哲学系后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所在,这方面工作的结晶

正是《现代西方哲学》这部对国内哲学界影响深远的巨著。可以说,我们这些对西方哲学感兴趣的晚辈学子都是在您的这部教材的引导和启发之下走进哲学研究的大门的。能回顾一下您编写这本著作的初衷吗?

刘:编写这部书的意愿由来已久了。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我的主要精力就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上。当我从全先生那里接受了这门课程的全部教学任务后,我就制定了逐步把这门课程较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计划:先拟订系统的教学大纲,然后编写出较完整的讲义,在此基础上编写出较好的教材。然而当我具体着手这样做时,又感到困难重重。

首先是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当时几乎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在评述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认为是传播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甚至引出政治上的麻烦。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反右和“拔白旗”等运动中出现的那些政治批判事件历历在目。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知识基础和理论水平比我高明得多的兄弟院校的同行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因此,从事这项工作必需时刻注意防止在政治上受到追究。正是这种顾忌,使我那时也无法越出“左”的批判框架。明知这种框架不对,也不得不暂时保留。

其次是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原有基础极为薄弱。尽管一些前辈学者早在解放前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一些西方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有所介绍,但大都较为零碎,并未形成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起,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极少有人再涉足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原有人员也大多转向哲学史等其他领域。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例如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批判)及为批判目的作为反面材料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各大学哲学系均不开设本学科课程。本学科的研究实际上被中断了,形成了事实上的空白局面。为了把本学科作为一门课程建设起来,在尽可能吸取前人和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必须有从零做起的思想准备,对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一个一个地从头加以研究。我自知根底浅薄,智力平庸。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头几年中,为了建设好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程,我可谓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到 1964 年时,不仅这门课程的开设较为完整了,而且已编写出了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相当一部分流派的讲义,个别部分还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当时已和一家出版社约定在 1967 年以前编写出一本较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来。然而,正当我的计划在顺利进行、可望按期完成时,国内政局剧变。

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之中,本来就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现代西方哲学,这时更进一步被否定。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谈论它们的实际所是。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也被迫完全停止,原已写成的书稿和收集的相当一部分也在那个年月丢失。然而我的这些工作没有白费。已做过的工作在我头脑中毕竟留下了较深的痕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路线得到纠正,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实施。就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而言,尽管还有不少障碍,甚至还存在着各种风险,但总的说来,条件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这使我有机会恢复和继续被迫中断了十多年的研究。过去收集的材料和写成的书稿虽不少已丢失,但仍可以想法恢复过来。因此想到我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较快地编写出一本相对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来,那对促进我国本学科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对哲学专业中本课程的开设,也许还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于是,尽管明知不可能编写得完善,我还是决心尽最大努力将其完成。

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如何确定评价标准上。“左”倾时期那种对西方哲学简单地全盘否定的态度当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这就不易掌握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长期以来被教条化、僵化了。许多哲学教科书上讲的和某些权威人士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大都是这种教条化、僵化的理论。它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或者说“异化”。用之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给后者贴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标签,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那么什么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评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呢?哲学界在这方面并无共识,我个人就更难回答了。

正是由于面临这种困境,在1980年召开的本书的审稿会上,江天骥和苗力田先生建议我尽可能把现代西方各派哲学本身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不要勉强去进行批判,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我虽然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未敢照办。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如果缺乏批判,在政治上可能引出麻烦,因为我强烈感到“左”的影响在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还相当严重。对于习惯了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及其批判模式的许多人来说,在哲学观念上要发生较大变化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如果在这本可能流传较广的教科书中对现代西方哲学缺乏批判文字,很可能被指责为放弃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于是我基本上仍采用了流行已久的并被普遍认可的批判模式。只是在这个限度内尽可能多作些客观的介绍,在较有把握的地方作些肯定。

在一些朋友的合作和参与下,《现代西方哲学》终于在 1980 年编写完成了,1981 年正式出版,经人民出版社推荐,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统编教材。

姜:这样一部破旧立新的著作,在当时想必也经受了一些负面的阻碍吧。从今天的角度,您对这部作品又有怎样的评价?

刘:可以这样说吧!

由于有上述困难,本书当然是不完善的。主要缺点是对有些哲学流派的介绍还不够具体和细致,偏离了它们本身的思想逻辑,例如把它们的理论纳入世界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方法论等预设的理论框架中,这必然产生削足适履之弊,从而必然存在不够准确和错误之处;对它们的评价虽与“左”倾时期有所不同,却未摆脱“左”的批判模式。但是,也许由于它是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本学科第一部较系统的论著,在我国本学科初创时期无其他较系统的论著和教材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它还是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要,因而出版后受到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些报刊把它当作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事件之一,先后作了报道和评论,特别是强调它对推动和促进我国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至于对本书的上述缺陷,大家似乎是以初创时期难以避免而表示谅解。在往后许多年内,它一直被多数兄弟院校采用。到 1989 年为止印刷了十多万册,比后来出版的本学科同类教材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它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获奖。包括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材首届一等奖、上海市社科首届一等奖。不过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不是这些奖励,而是许多年轻同志至今仍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他们正是在本书的激发下进一步去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这表明本书在本学科的重建中起了一定的开拓作用。

但本书的出版却也引起了一些持传统僵化观点的人士的不安。他们仍然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反动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哲学,关于这方面的书刊只能作为供批判的内部材料。现在将其公开出版,甚至成为畅销书,必然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大致在 1983 年左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浪潮中,某些权威部门依据下属单位的不切实际的汇报,把本书同另外两本书(休谟的《人性论》居然是其中之一!)一道当作传播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典型,并且通报全国。这不仅对我个人形成了沉重的政治压力,也使哲学界的许多人士感到震惊。因为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处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它的主要缺陷之一正在于没有摆脱“左”的批判框架。如果这样的书真的被判定为是宣扬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那么又怎么能谈到在中国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研究呢?当然,80 年代的中国毕竟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经教育部和上海市领导部门的调查以及人民出版社等相关单位据理说明情况,有关权威部门后来改变了态度。这场风雨持续的时间不算长,不久就

雨过天晴了。

本书之受到广泛欢迎以及它所引起的政治风波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国本学科在 80 年代前期的状况:它已乘改革开放之风重新建立,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能摆脱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哲学思维框架和评价(批判)模式,或者说突破这种框架和模式的努力有时还会遇到沉重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而且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越是强劲,所遇到的阻力也越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因此在作出这种努力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操之过急。不过改革开放毕竟已是我国社会的主流,突破旧的哲学思维框架和批判模式也必将成为我国哲学研究,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可逆转的方向。尽管在我们遇到的这场政治风波过去后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还遇到过其他一些困难,但总的说来越来越走上了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现当代西方哲学名著被成批翻译出版,我国学者撰写的本学科论著(包括不同规格的教材)大量问世,其中不少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上已有重大进步。

姜:正是本着这样的求真和创新的精神,您之后又对这部教材进行了不断修订。

刘:我的确力图这样做,而且可以说是倾全力这样做。

《现代西方哲学》初版尽管在学科初创期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毕竟只能体现那一时期的研究水平。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本学科研究的重大发展和进步,本书已越来越显得过时。为此我们在 1984 年时就已考虑对之加以修订。由于困难较大,修订本一直拖到 1990 年才出版。修订的主旨是克服或减轻初版中存在的明显的缺陷,体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科研究的新进展。我们对各个流派的原始材料重新进行研究,借鉴了国内外的近期研究成果,力图对各派理论作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介绍,我们补充了一些新流派,原有流派也大都改写了。这些工作当然不是轻易能完成的。

不过困难最大还是在如何突破旧的批判模式上。为了试探学界和有关当局在这方面的容忍度,我在 1987 年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以“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等醒目标题的形式对长期流行的全盘否定实用主义的评价模式提出了全面的质疑。由于这种评价模式在国内外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共产党领导人中曾被广泛接受,我这样不加掩饰地对之质疑,显然是可能被人加上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的。而我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既是出于对以杜威为主的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有了较多了解,又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坚强信念,认识到以往那种对杜威等人的没有事实和理论根据的批判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使我感到幸运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并没有招来批

判,反而得到了许多同行专家的赞许。正是在这篇文章的促进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于 1988 年在四川成都举行了全国实用主义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特别是一些中青年专家就对实用主义和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评价达成了与我的观点极为接近,甚至更为开放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后来研究实用主义的人大都把这篇文章和这次会议当作我国几十年来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许多从事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的专家都对此作了高度的肯定。例如杨文极教授在他主编的《实用主义新论》(1990)中分几处全文引述了这篇文章。王元明教授在《实用主义在中国》(《哲学动态》2000 年 3 期)一文中谈到本文“是建国后近 40 年来第一篇比较客观地评价实用主义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成功使我在修订《现代西方哲学》时能较大胆地抛弃简单否定的旧的批判模式。例如不单以唯物—唯心来为各派哲学划界和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实际上也已提出了与初版大不相同的看法。例如肯定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许多进步,肯定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的同一性。不过,由于这些问题带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还不充分,因此修订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不是很明确、透彻。总的说来,与初版相比,修订本在论述的科学性和评价的客观性方面都有较大提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有关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论著曾一度相对受到冷落,然而修订本自出版以来印数仍是同类教材的许多倍。根据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当时的调查,大部分兄弟院校仍然以本书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中央军委甚至一次购买了几万册,发至团以上干部作为参考资料。这至少说明本书依然受到读者的欢迎,这对我们既是鼓舞,更是鞭策。

对修订本存在的不足,我们在它出版时就有较充分的认识,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对其作新的修订。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与作为指导思想、并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从那时起关注的中心就非常自觉地转向对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如果说在修订本出版以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还只是以实用主义等个别哲学流派作为例证,在此之后我们就转向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了。在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修订本以前要前进得多。修订本以前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成功使我们举一反三,完成了修订本的编写。修订本以后的对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完成了《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并于 2000